

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論文參閱之文獻可分為三方面，一為外商直接投資之定義及理論，二為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關係之相關理論，研究主體包括地主國（Host Country）及母國（Home Country），三為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發展及經濟整合影響之實證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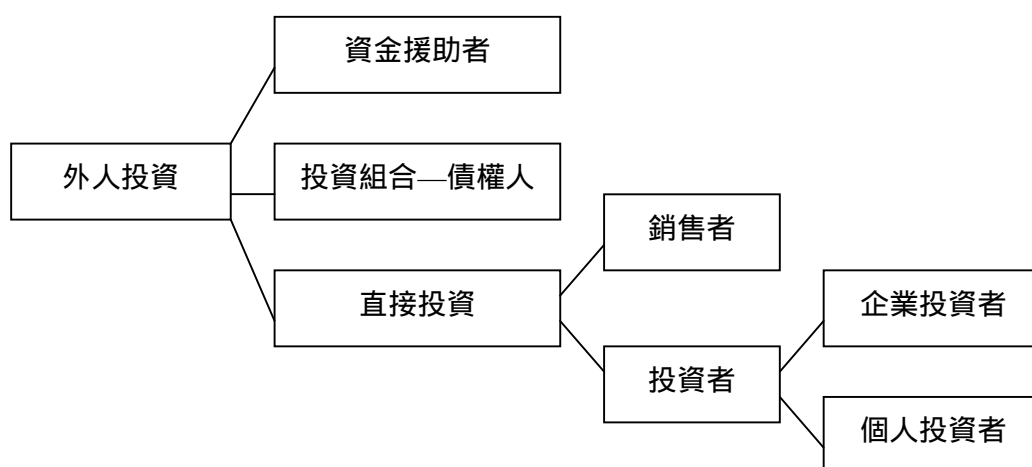
第一節 外商直接投資定義及相關理論

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理論於 1950 年代開始萌芽，研究文獻囊括了投資報酬差異說（Macdougall, 1951）、產品生命週期理論（Product Cycle Theory, Vernon, 1966）、無形資產說（Caves, 1971, 1974; Hymer, 1976）、防禦性投資假說（Defensive Investment Hypothesis, Kojima, 1978, Ozawa, 1979）、以無形資產假說為主的產業組織理論（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內部化理論（Internalization Theory, Buckley and Casson, 1976），以及折衷理論（Eclectic Theory, Dunning, 1989）等。各種研究文獻不論是從總體觀點或個體觀點切入，同樣都說明了外商直接投資的動機始終是為追求利潤的極大化。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資金流動歷經了相當戲劇性的增長。OECD（1987）將這股如洪水般的資金流動分類為官方援助、銀行貸款及直接投資三種。在直接投資方面，Oman（1989）則又將之區別為兩種形式的投資，即企業投資及個人投資。結合了 OECD 及 Oman 的分類，我們就可以描繪出一個外人投資的分類光譜，如圖 2-1。

外人投資主要分為三種型式，資金援助、投資組合及直接投資。投資組合的內容主要為銀行貸款，亦是外人投資中較常採行的型式，意指包含了政

府貸款、國際組織貸款、抵押借貸及短期貸款(銀行貸款和出口信託)等型式。債權者與直接投資者的不同之處則在於涉入當地操作及對所有權的控制程度不同，債權者並不直接影響地主國的所有權及管理，直接投資者涉入程度則較債權者為深¹⁵。



資料來源：OECD(1987, p.189)；Oman(1989, pp.1-4)；Reuber(1973, p.52)

圖 2-1 外人投資分類光譜

直接投資又可依投資者的投資行為分為銷售者及投資者。銷售者是指外國資金投入的主要焦點在於銷售投資資源，例如工程設備，其主要是顯示出一種銷售的操作而非投資（Oman, 1989）。在投資者方面，外人投資則是相當著重於策劃公開的或秘密的投資策略，這些投資策略關係著投資計劃產生利潤的能力。另外又可將投資者依投資主體的不同區分為企業型及個人型，企業型的投資者通常多會將投資的風險及成本分散到投資地主國的公司中，使得在外的投資風險及成本不會影響母國公司的營運，而個人型的投資者則通常承擔著全部的投資風險及成本。

Dunning(1993)指出了外商直接投資的四項主要原動力，一為尋求自然資

¹⁵Ping Lan, *Technology Transfer to China throug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ngland: Avebury, 1996), p.36.

源，二為尋求國外市場，同時包括地主國的市場及影響所及之其他國家市場，三為重建生產者的附加價值系統，以改善效率及增強競爭力，四為擴大的資產規模，如此可以降低風險、獲得規模經濟及建立共同合作機制、或是強化企業在國家及世界市場的競爭地位。

外商直接投資在本質上可說是跨國企業在內部進行生產佈局調整的成果。除了從事對外直接投資之外，企業也可以利用其他方式達到上述的幾項動機，例如出口商品或出售專利、商標、證照給國外製造商。因此，部份文獻嘗試將外商直接投資的動機作更深入地分析，例如跨國企業希望能夠在國外市場以獨資或合資方式投入內在的生產調整，也就是說企業在利潤最大化的前提下，會將「內化」的變動與對外的品質控管、監督、運輸及行銷成本等變數作一通盤考量及估算。

中共明確將外商直接投資定義為「指外國企業和經濟組織或個人（包括華僑、港澳臺胞以及我國在境外註冊的企業）按我國有關政策、法規，用現匯、實物、技術等在我國境內開辦外商獨資企業、與我國境內的企業或經濟組織共同舉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作經營企業或合作開發資源的投資（包括外商投資收益的再投資）以及經政府有關部門批准的項目投資總額內，企業從境外借入的資金。」¹⁶在此定義之下的外商直接投資包含了三個內容，第一，投資人主體可為企業或個人；第二，投資形式主要有三種，外商獨資、中外合資經營及中外合作經營或開發；第三，投資內容有兩項，其一為用現匯、實務、技術在當地的投資與收益的再投資，其二為在批准的項目總額內，企業從境外借入的資金。

¹⁶上海統計年鑑（2001年）（北京：中國統計，2001年），頁440。

第二節 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關係之理論

新的成長理論認為外商直接投資與國內投資同樣對於一國的經濟成長是相當重要的因素。外商直接投資不但可以透過技術移轉提昇地主國的生產效率，並且也與貿易流動、外國需求交換等因素具有複雜的聯繫關係，因此外商直接投資可說是透過許多不同的方式影響著一國的經濟成長。首先就目前各種研究報告中所探討的主要四個面向來分析外商直接投資與地主國經濟發展的關係，包括資本形成、工資及就業、技術移轉，與進出口貿易等。

一、對資本形成及經濟成長之影響：

在Sir Roy Harrod建立之經濟成長模型中，認為能否維持所得適度成長率（Warranted Rate of Growth）決定於社會儲蓄傾向及資本產出率，Evsey Domar的經濟成長模型亦認為所得均衡成長率決定於儲蓄傾向與投資生產力，兩者十分相似，一般將之合稱為Harrod-Domar模型¹⁷。在封閉經濟體的前提下，C. P. Kindleberger則再進一步將Harrod-Domar模型分析式加入人口因素，因此在既定人口增加率與資本產出率之假設下，一國的平均個人所得成長率是由該國國民儲蓄率大小所決定¹⁸。但是在落後國家及地區，儲蓄量普遍不足，對於經濟發展形成嚴重的限制，因此外資的引進便具備了補充資金缺口的功能，進而得以推動經濟成長。

上述 1950 年代發展出的經濟成長模型大多主張資本積累為成長的主要來源，而外資在其中所擁有的經濟功能主要有二，一為外資增加了地主國的總投資財源，擴大該國的生產能力，並提高經濟成長率，二為外資之獲得並非由地主國的資源所換取，使該國可以不減低當期消費水準而提高資本積累

¹⁷ 張淑真，**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影響之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頁6-7。

¹⁸ C.P. Kindleberger,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Mc Graw-Hill Book Co., 1958), p.39. $dY=S/Y-dL$ ， dY 表示平均個人所得年成長率， S 代表儲蓄傾向， K 代表資本產出率， dL 表示人口增加率。

的能力，即減輕一般公眾所付出的代價¹⁹，同時創造更多的利益。因此若外資獲得適度地運用，則投資規模或可與成長率之高低產生連動性，尤其對落後國家而言，由於所得水準低下導致儲蓄不足，因此適度引進外資可以彌補國內儲蓄之不足，進而刺激經濟發展。

至 1960 年代開始出現「雙重缺口」理論，其結合探討外資、資本形成、貿易及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此理論認為一般落後國家在發展初期不僅存在儲蓄缺口的限制，還由於國內經濟缺乏調整機能，短期內國外進口投入品與國內生產要素之間不具備替代的可能，而出口外匯收入又不足以支付在經濟成長中不可或缺的進口投入品，此時若適時適量引進外資，不但可以補充儲蓄缺口，亦可彌補貿易缺口²⁰。

McKinnon則將雙重缺口理論一般化，並根據Harrod-Domar的成長理論導出經濟發展的限制模型，其認為在一般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主要限制因素來自於本國儲蓄及外匯，而淨外資流入則對於紓解上述之限制及對促進經濟發展有所貢獻²¹。

但另有學者認為引進外資會取代開發中國家之部分國內投資及儲蓄，尤其外商利用行銷手段及市場獨占的力量來刺激當地消費，會降低開發中國家的儲蓄傾向。另外，外商從其海外關係企業輸入之中間投入品亦會抑制開發中國家（地主國）中間財產業之成長，不利於資本形成及經濟成長。Griffin與Enos（1970）同樣認為雖然外資引進能夠有助於經濟成長，但是亦會排擠國內投資，從而使國內儲蓄下降；再者，若外資帶進的是不適合或較落後的技術，也不見得會提昇地主國之生產效率²²。

二、對工資總額與就業量之影響：

¹⁹ 黃俊隆，**外資與台灣經濟發展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學國際貿易所碩士論文，1977年），頁7。

²⁰ H.B. Chenery and A.M. Strout, "Foreign Assist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LVI (1966) pp.678-773.

²¹ 黃俊隆，**外資與台灣經濟發展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學國際貿易所碩士論文，1977年），頁9。

²² Keith B. Griffin, and John L. Enos, *Planning Development* (Lond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1970)

W. A. Lewis的發展理論依據下列假設建構：(1) 在落後經濟社會存在著傳統農業部門和現代工業部門，(2) 傳統農業部門擁有過多的勞動力，以致於部分勞動者的邊際生產力等於零，形成隱藏性失業，(3) 現代工業部門就業量的成長是隨著資本累積比例增加，(4) 資本家將利潤全部用於轉投資，(5) 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高於傳統農業部門，因此吸引勞動者由傳統農業部門向現代工業部門移動，(6) 在固定工資水準下，現代工業部門之勞動供給曲線具有完全彈性。其理論指出傳統農業部門在一定的生產技術及資本的情況下，產量決定於勞動人口。若傳統農業部門之勞動邊際產量為零，並且每一勞動者均分產量，則實質工資決定於平均產量。現代工業部門方面，在一定生產技術及資本的情況下，假設現代工業部門之勞動市場為完全競爭，由農村流出的勞動供給具有完全彈性，產量亦決定於勞動之就業量。由於資本家將利潤作再投資，因此資本積累會使得總產量及勞動需求都會擴大，工資總額及利潤也都會再增加，資本家再將獲得之利潤再投資，使得就業量、總產量、工資總額、利潤都會繼續提高，經濟因而發展。落後國家由於國內儲蓄不足，可使用之資本稀少，若能引進外資投入現代工業部門，則可達到經濟發展之目的²³。

Fung, Zeng and Zhu (1999) 利用了三部門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探討在小型開放經濟體 (Small Open Economy, SOE) 中，外資、城市失業率及經濟成長的關係。三部門採用 Harris-Todaro 模型中的兩項可貿易產品 (進口製造業產品、出口農業產品) 及一項中間財，並且假定中間財部門為小型開放經濟體經濟成長的主要來源。研究發現在小型開放經濟體下，外商直接投資對於城市失業率、勞工工資、國內資金收入、內部資本流動的影響可以從 Harris-Todaro 模型中得到結論。同時研究也發現經濟成長率的大小，與部門

²³ 張淑真，**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影響之研究** (高雄：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頁14-15。

間的資金流動傾向、國外投資的標的部門、替代彈性、消費財的生產水準息息相關。

三、對技術移轉之影響：

Kuznets在衡量及分析發達國家國民收入的增長方面取得開創性的研究，其對一國經濟增長的定義為「經濟增長是建立在技術進步和所需的制度和意識型態調整基礎之上，並不斷提高向本國人提供日益多樣化的商品能力」，其中指出了技術為經濟成長提供了基礎，是一個必要條件²⁴。外商直接投資對地主國技術發展的影響受到許多學者廣泛地討論，例如Steuer (1973)、Frank (1980)、UNCTC (1985,1987)、Roman (1986) 及Blomstrom (1990) 等。我們可以將各個文獻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對地主國技術發展的影響分為三種類型，包括了激勵效果、捷徑效果及外溢效果。

外商直接投資扮演的激勵角色意味著其可以促使企業採取更多有效的方式以增加 R&D 或更快速地使用一些獨特的技術。因為過去的企業可能並未察覺技術的存在或是技術與獲利之間並未達成有效的連結，而激勵機制正可以促使國內企業透過購買、轉包或是其他方式達到上述的目的，也就是透過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競爭壓力來使得原本國內的市場獨占者轉向競爭市場。

捷徑效果係指以較低的成本得到某些技術，例如子公司可以較低的成本或零成本來運用母公司的研究成果，因而新產品就得以壓低成本並且可以更有效地推銷。因此透過外商直接投資，當地企業就可以有機會獲得新的技術，獲取新技術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為將子公司及母公司的 R&D 及技術資源作連結，另一為由各地的子公司來分工負責研發活動，並分享研發成果。

²⁴ 于同申、蘇蓉生等譯，Todaro, Michael P.著，**第三世界的經濟成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頁160。

外溢一詞被使用於描述外商直接投資引起的外部性。技術的擴散主要是透過人員的移動、契約買賣或是模仿三種方式，而技術傳遞至地主國原有產業的管道亦可分為三種，一為資產分派後出現新公司的編制，二為一種反向的連結，即當地中間財的投入增加帶領了內生供應產業的興起，三為一種正向的連結，即產品製造商與一般科學與商業團體建立互動網絡。²⁵

在技術移轉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方面，Fei & Ranis (1964) 以整個工業部門為例，提出每人產量增加率的決定因素在於創新的強度及每人資本成長率，即由於每一勞工之資本設備不斷增加，或是技術提昇，皆能使其生產量增加。外資之流入可使勞工資本設備增加，並且有先進技術移轉之機會，有助於國家整體之經濟成長。

除了Fei & Ranis所建立的模型外，許多內生性成長模型也都指出「做中學」(Learning-by-doing) 是啟動成長的一個重要因素²⁶。對於技術提昇的衡量及測試指標多數實證研究採用廠商別或產業別的資料，以廠商的勞動生產力指標作為測試依據 (張帆、鄭京平，1999)，也有以廠商的技術效率 (Technical Efficiency) 指標來衡量 (鄒孟文、劉錦添，1997；宋子文，2000)。

四、對進出口之影響：

Kojima提出的「因素稟賦學說」是假設母國與地主國的生產函數有差異存在，並且假設外商直接投資是母國某產業對地主國同一產業的投資，因此地主國接受外商直接投資等於是改變了生產函數，而且會導致地主國該產業的生產曲線向外移動。例如地主國是勞力相對豐厚且成本較低的國家，外商即選擇投資於地主國的勞力密集產業，因此在貿易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資本

²⁵ Ping Lan, *Technology Transfer to China throug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ngland: Avebury, 1996), pp.60-61.

²⁶ Gene M. Grossman, and Elhanan Helpman,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2); Robert E Lucas, J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1988), pp.1-42; Paul M. Romer,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5 (1990), pp.71-102.

密集產業產量減少，勞力密集產業產量增加，如此就會致使貿易的機會提高。外商直接投資此時就扮演了促進貿易增加的角色，此稱為「貿易導向」(Trade-oriented)的外商直接投資，亦即「互補性的外商直接投資」。反之，若外商直接投資於地主國較不具有比較利益的產業，則會使得兩國的貿易量減少，也就是「反貿易導向」(Anti-trade-oriented)，亦即「替代性的外商直接投資」²⁷。

在 1970 及 1980 年代，許多新興工業化國家 (NICs) 的發展模式為新古典經濟學者的出口導向成長理論作了成功地見證。多數的文獻都認為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主要取決於當地的發展程度及經濟結構。對於低度發展國家而言，出口擴張對於經濟成長並無法具有顯著的影響。當經濟發展達到相當高的程度時，出口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同樣也會比中度收入國家要低。因此，唯有當對外導向的發展政策使中度收入國家達到最小程度的發展時，出口才能顯著地引導經濟成長，此即「最低發展程度假說」(Minimum Development Level Hypothesis)²⁸。近來許多學者分析認為必須經歷長時間且複雜的結構轉變與經濟發展，才能達到出口及經濟的成長²⁹，意即在不同的國家與地區對出口與經濟成長會有不同的衝擊，不僅是因為各地有不同的發展程度及經濟結構，還因為會受到經濟發展與結構轉變的動態交互影響過程的支配。

另有學者認為外資跨國企業以企業整體的最大利潤為主要目標，因而會對各地子公司的外銷市場加以劃分，並規定出口價格與數量等，同時禁止各地子公司在同一市場相互競爭，因此外資企業對於地主國政府的進口替代政

²⁷ 曾喜炤，**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台北：政治大學東亞所碩士論文，1994年），頁158-159。

²⁸ Haishun Sun and Ashok Parikh, "Exports,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Regional Studies*, 35:3 (2001), pp.187-196.

²⁹ B. Yaghmaian and R. Ghorashi, "Export Perform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Am. Econ.*, 39:2 (1995), pp.37-46.; R.M. McNab, and R.E. Moore, "Trade Policy, Export Expansion, Human Capital and Growth", *Journal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7:2 (1998), pp.237-56.

策通常會較為配合，對於出口擴張則容易受到較多因素限制³⁰。

其次，不論是基於所有權層面的動機，例如獲取較佳的技術、提昇產品差異化、充分利用企業精神及管理能力，或基於行為層面的動機，如保護寡占地位，或緣於本質層面的變動，如市場內部化，甚或是基於生產層面的動機，例如折衷理論等，對外投資都可能會對母國的經濟及產業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及衝擊。

就東亞地區而言，經貿整合最早可回溯至 1980 年代中期，美國由於貿易逆差逐年擴大，故要求日本及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NIEs）等主要對美貿易順差的國家調整通貨匯價。因此日本及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進行了一系列的經濟調整措施，包含了對外直接投資等，以因應通貨匯價的大幅升值。也就是將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移往生產成本較低的國家從事生產，例如東南亞地區及中國大陸，而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則由原本的資本輸入國轉為資本輸出國。在進行經濟調整的同時促成了東亞產業分工及經貿體系，其中就是以對外直接投資為主軸³¹。1999 年 11 月至 12 月間香港貿易發展局針對香港工商業者進行問卷調查，在 1344 份回收問卷中，對於投資考量因素的重要性依序為勞動力充足及工資便宜（94.7%）、土地租金便宜（90.7%）、地緣關係（84.6%）、投資優惠措施（73.1%）、語言文化相近（65.8%）、利用當地科研人才（44.5%）、爭取當地市場（43.3%）、因上下游產業移往內地（37.4%）、在海外市場享有配額（19.1%）。由調查結果我們可以發現港商對內地投資主要目的在於降低成本，並且其一般的基本經營策略皆為「生產在中國內地、市場在海外」³²。基於港商在大陸內地投資的特性，對母國經濟發展的影響方面，本論文將重點置於探討貿易影響及產業結構影響。

³⁰ 張淑真，**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影響之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頁 12。

³¹ 林照雄，**台灣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空洞化之實證分析**（台北：台北銀行經研究室，1999 年），頁 7。

³² 香港貿易發展局研究部，**港商對中國內地投資環境的看法**（香港：香港貿易發展局，2000 年），頁 6。

一、對貿易的影響：

如前所述，Kojima（1973）提出貿易導向及反貿易導向理論，認為對外投資的動機主要可分為三類，即天然資源導向、勞動導向及市場導向。天然資源導向主要是指母國會從地主國進口天然資源，而勞動導向則係指因為地主國勞動成本較低，產品生產成本也可因此壓低，具有市場競爭上的比較利益，此兩者都指出了母國對地主國是一種互補性的投資，故屬於貿易導向。另外，在市場導向中因為貿易障礙所形成的對外投資，外資企業仍會從母國進口關鍵零組件、中間原料、機械設備及技術等，因而會帶動母國的出口成長，此亦屬於貿易導向。在 Kojima 的實證研究中，認為日本對外投資多較偏向資源導向或是投資於勞動密集產業的標準化產品生產為主，所以具有貿易導向的效果，反之，美國的對外投資較偏向生產技術或行銷領先的領域，並以擴展當地的市場為主，故屬於反貿易導向。

二、對產業結構的影響：

對母國產業結構的影響方面，則因為移出之廠商多為製造業，因而可能導致母國的製造業空洞化，使母國的產業結構發生「脫離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現象。Rowthorn 及 Wells（1987）將脫離工業劃分為三種不同的型態，包括正面的脫離工業化、負面的脫離工業化及第三類脫離工業化。正面的脫離工業化係指健全且成熟的經濟體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正常現象，起因於製造業部門生產力快速成長，產量大幅增加，但是在生產逐漸自動化之下，製造業的就業量卻是呈現下降的趨勢。同時會因為服務業部門的成長所釋出新的就業機會，足以吸納從製造業流出的勞動力，使得整個經濟體仍維持在充分就業。另外，Matsumoto（1993）也指出脫離工業化可以有助於資源重新作有效地配置，使逐漸遭遇瓶頸的製造業在服務業的支撐下可以提昇生產效能與生產力。負面的脫離工業化則係指一種病態的經濟

現象。在此情況下，製造業產出下降或萎縮，使得勞動力必須從製造業大量釋出，但服務業尚未發展成熟，不足以吸納龐大的失業人口，因而整體失業率上升，影響國家整體經濟表現。Thirlwall（1982）更指出脫離工業化不僅會造成製造業失業人口增加，還會導致製造業產出量減少及對外貿易盈餘減少或出現赤字。Drache（1989）也指出脫離工業化會使得工業部門就業機會減少，以及生產能量會因為投資降低而呈現系統性的萎縮現象。第三類脫離工業化係指一國經濟出現某些自發性的因素，使得對外貿易部門的淨出口由製造業部門轉至其他部門，如服務部門。此種轉變會使得各項資源，包括人力資源，會由製造業部門轉向其他部門。Bluestone（1984）研究美國製造業時即指出整體製造業就業與投資的減少並非完全是脫離工業化的現象，因為可能存在產業間或地區間勞動力流動不完全的情況。因而雖然整體製造業的就業人數穩定，但是仍會出現某些產業或地區出現大量失業的現象，這就是產業間或地區間的勞動力流動長久失調，所以有否出現脫離工業化應該由一國整體的工業基礎是否呈現系統性的衰退來判斷。

第三節 實證研究

Grub及Lin（1991）認為中國大陸吸引外資之主要動機有四點，第一獲取外國技術、資本、管理、行銷經驗及網絡，第二增加外匯，第三提升共同研發，第四增進人民生活水準³³。

Sun 與 Parikh（2001）針對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的國家，如中國大陸，來探討出口與經濟成長的關係。多數實證研究都發現在過去二十年中，出口擴張及開放政策之下的外資引進對於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有直接且

³³ Phillip D. Grub and Jian Hai L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New York: Quorum Books, 1991) .

正向的影響³⁴，Sun 及 Parikh的研究更發現出口部門 (export sector) 的成長對於非出口部門 (non-export sector) 同樣也有強烈的直接外部影響，並且出口成長的貢獻對於整體經濟成長相當重要。另外，Sun 及 Parikh在研究中將中國大陸分為東部 (沿海)、中部、西部三個區域，這三塊區域有不同的發展程度及經濟結構，其研究發現出口成長及外商直接投資對於東部的經濟成長有顯著及正向的影響，但是對於中部地區卻是反向且邊緣化的效果，對於西部地區則完全不顯著。此篇文獻指出經濟成長與出口及外商直接投資的關係取決於地區的經濟及社會建制，包括了發展程度、產業結構、政策取向及開放程度。

Wu (2000) 則將外商直接投資與技術工人及非技術工人的相對工資變化作分析，並探索政策指示對中國大陸勞力市場的改革。其研究發現已開發國家對中國大陸的投資多是針對高科技部門中垂直區分的商品，大多都是資本或技術密集產業。開發中國家則多投資於低技術部門中同類或水平區分的商品，大多是勞力密集產業。其次，研究結果顯示不論外商直接投資占 GDP 的比例多小，都足以影響相對工資。再次，在高科技部門的外商直接投資會使得其技術勞力相對於非技術勞力的工資增加許多。在智慧財產權方面，Wu 亦指出中國大陸逐漸發展更高階的出口會使智慧財產權受到更嚴格的保護，並且會促使貿易進入更好的階段，同時相關的高技術勞力工資也會增加，另外低技術勞力也會受到某種程度的社會福利照顧。此種交替關係係指對智慧財產權作更嚴格的保護就有如使國內企業面臨外國企業更大的競爭壓力，並且可能逐漸出現喪失市場佔有率的危險。然而，外商直接投資連帶使得技術迅速擴散，亦能激勵國內企業發展更新更優良的產品。

Zhao (2001) 則使用中國大陸城市的微觀資料來檢視國營企業與外資企

³⁴ K.W. Li and W.S.C. Leung, "Causal Relationships among Economic Aggregates in China", *Appl. Econ.*, 26 (1994), pp.1189-96.; Lardy, N.R., "The Role of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December (1995), pp.1065-82.; J. Xue, "The Export-led Growth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hina", *Hitotsubashi J. Econ.*, 36 (1995), pp.189-206.

業的相對工資，以及分析城市勞動力的就業選擇。Zhao 提出一種假說適用於出現分裂的勞力市場以及勞力移動成本較高的國家。中國大陸人民若是非城市居民，則需要透過教育的途徑或其他特定方式才能晉升為城市居民，也才能享有城市居民的權利，因而在勞動力市場上就出現分裂的現象，在非城市居民部門及非國有企業部門中大多都是非技術勞動力，技術勞工則多在國家部門。外資企業則可以從非城市居民部門中，以較低的成本僱用非技術勞工從事在經濟體中的第三產業工作，同時也必須給予技術勞工比原有更多的報酬。因為國有部門勞工存在移動成本，就進一步促使外資企業必須給付更高的薪資報酬給予技術勞工，所以技術勞工的相對工資在外資企業就比在國有企業要高出許多，在實證研究中也顯示出同樣的現象。另外研究也發現，因為外商直接投資相對提高了技術勞力的工資，致使僱用技術勞力對國內非國有企業而言是相當昂貴的，因而國內私人企業通常會選擇專攻一項技術，如此只要僱用較少的技術持有者即可，尤其多會選擇大學的畢業生。

多數實證研究都指出中國大陸在許多制度及內生結構上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特性可能會對後續的經濟發展產生不同於其他開發中國家的影響，所以較其他開發中國家容易出現分裂發展的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工資、資金流動等方面都會出現二元或多元的分裂現象。屬於已開發經濟體的香港對於開發中經濟體的上海投資，是否會對上海的經濟發展產生上述文獻所提出的問題，將是本論文的重點之一。

馮國釧（1997）認為香港與中國大陸貿易與投資的整合不斷加強，對香港主要會產生三項影響，一為中國大陸的經濟自由化會促進香港的繁榮，香港廠商可以利用中國大陸的市場、廉價土地及勞動力，促使轉口貿易發展、保持國際競爭力，進而提昇香港生活水平，但是同時也可能出現需求上升引發通貨膨脹；二為隨著中國大陸出口機會的增加、市場的發展及在貿易與投資上提供愈來愈多優惠的服務與便利，都將使香港勞動力市場趨於緊張，向

海外移民的現象又會使之更爲惡化；第三爲工資及租金不斷上漲，使香港廠商愈趨於將低階及高階的生產轉移至中國大陸，這樣的轉移是相當自然的現象，但是結果可能會導致香港相當程度的非工業化。這一結構轉型過程發生得相當迅速及徹底，雖然香港總失業率保持在低水平，但是相當多製造業工人卻面臨轉業的困難。因此總歸來說，對中國大陸投資的大幅度增長使得香港面臨了通貨膨脹、緊張的勞動力市場及非工業化的衝擊。

香港相關研究文獻多是針對港粵的經濟一體化作分析，上海市場則是較爲新興的投資選擇，港資對上海的投資特性與投資動機在相當程度是不同於對珠江、深圳等地的投資性質。因此，香港如何與上海作經濟連結，並且港商對上海的投資又會對港滬的經濟發展造成何種衝擊，這些課題都是本論文試圖探討的領域之一。